

我所知道的東方雜誌

黃良吉

民國十五年六月，名報人戈公振先生在其「中國報學史」的傑構裡，於述及清末雜誌界勃興情景時，曾盛讚東方雜誌的成就，謂為「雜誌中時期最長久而最努力者」。(註1)

迨二十年春，邢雲霖先生著「中國雜誌史簡述」(註2)，列東方雜誌為有志人士所辦，記載國家大事，介紹新智識與學說的刊物之一，復強調東方雜誌「於今尙繼續出版，可謂舊誌中之魯靈光矣」。及二十二年夏，畢樹棠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六十四號，發表「中國的雜誌界」(註3)，這篇長達五千餘言的文字，係就當時尚存在的三百餘種中文雜誌精華，分類加以論評，而且可說是褒少貶多的。畢氏認為，「若嚴格的別擇起來，站得住的實在有限」。惟畢本人對東方雜誌，則有甚高的評價。他指出東方雜誌與新中華，申報月刊，係書店雜誌類中「標準最高、出版最好的。」樹棠先生接着說：「餘如大東、世界、北新、光華、黎明、神州國光社等書店，每家必有一種以上的雜誌，東西好壞無定，出版是極隨便的。再次一般野鷄式的書店，不足置論。上海的文人學者，作伴他們的食客，互相利用，精神方面是極不堪的。」

至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申報第二張第七版，登「中國定期刊的黃金時代」，作者孫鶴先生略論清末到民十三的中國定期刊物，其中且謂東方雜誌若干嚴謹的學術論文，「即使今天看來，也未必完全失去時效，雖然世界學術三四十年來有長足進步。」

「東方」不僅受國人重視，它同樣引起外人注意。蘇俄學者伊文，於民初出「中國與蘇聯」一書，專章討論我國言論界，東方雜誌即佔該章論評的中心地位。伊文以為東方雜誌乃「中國輿論大多數趨向的指示器」。(註4)

由於我學的是大眾傳播，像這份我國雜誌界的重鎮，而享有最悠久生命，歷久不衰的「東方」，正是我刻意探討的絕佳對象，我「見獵心喜」之餘，豈肯輕易錯過。剛好五十七年初，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二年級，課程較前為輕，遂利用餘暇，儘量涉覽東方雜誌自民前八年創刊，至今六十餘年的全部文字，以及與該誌有關的資料。我除鑑賞「東方」波瀾壯闊的動人處外，更進一步根究其源遠流長的濫觴處，也就是其精神所在。埋首半年，幸告完成。後撰「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一文，以自述心得。在此謹就該誌的若干貢獻，一抒所知。

(1)

我極景仰東方雜誌一貫的愛國、愛民族抱負。這是一種從大處着想，視野廣闊的明智做法。有人指出：「讀者最感興趣的事，就是他自己，十七世紀法國劇作家莫里哀 (Moliere) 曾說：『我們都是凡人，每人都為他自己』」，其他社會學家如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等亦有類似說法。美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格里雷 (Horace Greeley) 曾說：「對一般人而論，最有深刻興趣的事，就是他自己；除了他，就是他的鄰居。」(註5) 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若無國家和民族的庇蔭，個人興趣如生命安全、經濟安全、慾望滿足等等何從獲得。因此東方雜誌於民國二十七年特忠告讀者，說「個人失掉國家民族的保護，不能自由生存和發展，猶太人到處受人欺侮壓迫，就是一個明證。所以保衛國家民族即所以保衛個人自己。為國家民族求出路，即所以為個人求出路。吾人應於軍事、政治、外交各本所知，各盡所能，以貢獻於當局。際此國家民族存亡興衰之嚴重關頭，願共勉之。」

(註6)

數十年來，祖國多災多難，同胞顛沛流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知識份子尤不能不在言論上，對復興中華運動有所獻替。東方雜誌自遜清末年創刊起，對列強的侵凌中國，口誅筆伐，不嫌其多。對不平等條約的成為國人桎梏，抨擊再三。「民族運動號」、「條約問題專號」(註7)，俱見該誌存心。

日俄戰爭時期，兩強均以東三省為戰場，俄軍侵入遼西中立之地，規奪淫亂，我實行中立之旨被破壞無遺，在這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淒涼景況下，東方雜誌起而呼籲國人勵國耻，以雪國仇，明耻教戰，以求殺敵。其愛深責切之意，殷殷勸勉同胞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

「遼河以西為中立地，劃歸戰地以外，戰國不得任意攔入。俄人固已承認之，而何以近日俄兵之侵入遼西中立之地……乃多至二千三百名之家，而又收吾三省警兵之器械，奪我三省商民之財產，壞我三省子女之名節……」(註8)。

「滿州三省……由敵強佔，重足屏立，不敢拂忤，以讎為友，攘垢厚顏求存於角逐之場，無時無地固無可以存立之道也……是以任俠復讎之舉，里巷之間往往絕迹，古義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者，今已不復見，豪儒之夫，難成勇國，遂至於此極也……傳不云乎？明恥教戰，以求殺敵。」(註9)

在日俄兵戎相見，勝負未分之際，東方雜誌一再鼓勵國人自立自強，以救亡圖存，「今者戰事方殷，列國旁觀、干涉未能，瓜分未定，正天

所以界我上下發憤自強之時，荷急起而直追焉，安見此弱者不可復強，亡者之不可復存乎。」(註10)

而顏李學派，經戴子高紹述之後，到民十年左右始有重光的機運，但東方雜誌在距其二十多年之前的日俄干戈時期，已有介紹顏李學的文字，以鼓舞國人救衰起弊。光緒三十年四月，「東方」第四期汪允宗先生(狸照)在「論中國有救弊起衰之學說」一文，即強調明末顏(元)李(璫)學派，係鑄孔墨於一爐，顏習齋「苦筋骸、節嗜慾，明習世務，欲措於用」，李剛主「躬耕，自食」，「其最切於今日救弊起衰之用」者，就是「有尚武精神，可以造軍國民，有貞固道德，可以救偷俗，有實業教育，可以補生計」，

「今日當過渡時代，以舊學為不適用，而競唾棄者……無論學說器物，皆以外至者為尚……既執此輕內重外之見，遂以細敗為當然之公例，其愧作既無由生，其心競即不復振率，是以敵之待我，不必堅甲利兵，我已冰漁瓦解，今日欲圖存……用固有之學說相得而有功者，實無逾於顏李二氏。」

「東方」對內則痛責民初北京政府租借外債之誤國(九卷一號)，民四年十月十日出版的「東方」第十二卷第十號「內外時報」欄裡，且刊登梁任公「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及汪鳳瀛氏「致籌安會書」，以駁斥楊度氏「君憲救國論」，指責古德諾所謂「共和與君主論」的邪說。民五年袁世凱稱帝，東方雜誌亦未印用洪憲紀元。同年七月十日，「東方」十三卷七號刊杜亞泉先生(倫父)的「天意與民意」社評，直指袁氏稱

帝係違背民意，終難免消滅。「東方」對於政客官僚的玩法弄權，禍國殃民，屢加嚴斥，不遺餘力(註11)

尤其是在對日抗戰期間，東方雜誌鼓舞士氣，團結民心的功勞，不可磨滅。除了言論鼓舞軍民與日寇作殊死決鬥之外，東方畫報的照片，適時發揮了其深遠的影響。我看畫報上並茂的圖文，我難忍熱血沸騰、熱淚奪眶：

「蔣委員長悲壯宣言：『……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罹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地步，……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踏着光榮的足跡前進(二十九軍喜峰口殺敵之回顧)：民國二十二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忠勇抗敵，全國感奮，……現在日軍又進侵華北，蔣委員長已作堅決抗戰之表示，二十九軍適當國防前線，自必將本昔日喜峰口之精神，繼先烈光榮之足跡，奮勇為國殺敵也」(照片為：馬隊衝鋒、關山萬里，二十九軍截獲之敵軍坦克車，演習刀手，當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射擊日軍之狀況)

「國防前線之將領：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兩度負創之二十九軍團長吉星文英姿。」

「蘆溝橋是我們的墳墓(忠勇衛國之二十九軍將士壯語)：二十六年七月八日晨一時，日軍砲轟蘆溝橋，我二十九軍將士奮勇抵抗，誓死殺敵，並悲壯宣言：『蘆溝橋是我們的墳墓！』」(註12)

「東方」開我國雜誌附刊畫報的先河，自創刊號起，即於正文前置揮畫若干幅，後改稱東方

畫報，搜羅益見宏富。圖片給人一種親切的，如身歷其境的感受。其動人心弦的效果，迅速而長遠。

(11)

關心國計民生的「東方」，在五卅慘案發生時，奮勇而起為民喉舌，仗義執言，作遭列強壓迫之同胞的精神後盾，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至今猶為人所津津樂道。而王雲五先生以「東方」發行人的身份，實際上這次難能可貴的事件，係由他所領導、所推動。

說它難得，是因為民初上海的報界，在一片奄奄無生氣的頹唐中，屢受租界工部局的制裁，無人敢於挺身出來為自己的國民，為可敬的學生，為可憐的工人說公道話，然而東方雜誌却不平則鳴，起來主持正義，說出報界不敢說的話，爭取大家所不敢爭取的新聞自由，自然就彌足珍貴了。雖然王雲五先生因而被判罰款，但是事後東方雜誌銷路却迅速上升，達到最高峯，可見「東方」這一頁為公忘私的精彩作為，是如何的反映民意，是如何的贏得民心。

五卅事件前後，上海租界的報紙，在出版附律的束縛下，輿論不得伸張的情形，從下面一段文字，可知其端倪：「現在報上登一篇宣言就要罰金（去年商報會因登載某紗廠工人宣言，罰金百元），提起巡捕毆打小工的事，就要被傳了……上海的報界便如同小孩子怕賠似的養成了過份畏懼的心理，便是明明登出來也不碍事的新聞也不敢登了。……去年顧正紅一案，各報因了這

種畏懼心，非但不敢說一句公道話，甚至連事件也抹殺了不登，因此釀成了五月卅日南京路上空前的慘案。自從鬧了這場窮禍之後，上海各報益發陷於可憐的地位了。他們對於新聞的取捨，既怕就地當局的干涉，又怕社會的反感，夾在兩重的威脅之間，頗有不知所措的情勢。」（註13）

反觀各外報，多為虎作倀，掩飾帝國主義屠殺我國民之殘酷罪過。「各西報除對於學生演講，張大其詞，謂為出自排外過激之動機外，並於群眾擁聚老關捕房門口一事，加以暴動之罪名，藉以辯護槍殺市民之行為。」（註14）

對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公共租界老關捕房在南京路門前，槍殺我國遊行演講群眾，激起全市罷工，罷課，罷市運動，租界華報反應既屬沈寂，西報復的混淆視聽的情形下，王雲五先生毅然站出來說話。岫廬先生激於義憤，首先以英文投書美國人所辦的英文大陸報館，引據法理，指責英捕頭的狂悖，以及英租界當局的違反正義，徇私庇護英捕。投書引起若干公正人士的共鳴，英領事館已開始對岫廬先生注意。從那時起，許多大學教授與王雲五先生聯絡，伸張正義。雲五先生並決定由東方雜誌出一專刊，討論五卅慘案，主持正義。

「五卅事件臨時增刊」於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內容有「五卅事件之責任與善後」、「五卅慘殺事件事實之分析與證明」、「五卅事件紀實」、「什麼是誠言」、及「會審公堂紀錄摘要」、「重要函電彙錄」等六篇。

「五卅事件之責任與善後」係王雲五先生所

實，乃根據事理，論定英人應負之責任及善後應採之方法，而於論定之前，又證明我國學生對於此案並無應負之責任。其立論精闢，絲絲入扣，總結文字為：「查五卅學生遊行演講之目的，既如前述，係於被壓迫之言論界以外，另用他法宣傳願案，並於市參政權被工部局剝奪之時，另用他法抗議有害於中國國家及人民之法案。設我市民在租界內得與外人享同等自由及參政權利，則此次大慘案所由發生之遊行演講，或不至實現。……總之，五卅慘案不平等待遇之所致也。……」

王雲五先生在「什麼是誠言」一文，亦力駁斥「誠言」的荒謬。「誠言」是「五卅」時，英人在上海主辦的專為「五卅」事件辯護和歪曲事實的刊物；第一號刊載英外長張伯倫談話，第二號刊載廣州沙面慘殺案，說由「駐粵英領事證明，先開槍者實為華人」；第三號說「五卅」運動為蘇聯「對中國的野心」。「那時有幾家報館登載了『誠言』廣告，因受社會的攻擊，便只好停登」（註15），而岫廬先生則是抨擊租界當局這種匿名刊物，不遺餘力的。他指出張伯倫談話的似是而非，指陳駐粵英總領事作證的站不住腳，「以直接擔任彼方交涉責任的英領事，自己替自己做證人，這種證據，無論在法律上或習慣上，究竟能認其成立嗎？」他更闡明不平則鳴的道理，揭穿「誠言」第三號的謊言，「誠言第三號是說蘇俄對於我國的野心。其目的在將五卅慘殺過於赤化。按此次學生遊行演講乃基於人道，正義和民治精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在赤化這

個名詞尚未出世的時候，已經是如此的。」

陶希聖先生當時擔任商務書館編譯員，「五卅慘殺事件事實之分析與證明」就是希聖先生的手筆，陶先生此文係根據客觀的資料，就英捕頭在英國法庭供詞作詳細分析和報導。每敘述一段事實，均註明引用的資料名稱。這些資料包括申報、新聞報、字林報、大陸報、公廨審訊記錄，學生會傷亡調查表，南京路商會搜集目擊五卅慘案者之報告。

王雲五先生「五卅事件之責任與善後」及陶希聖先生「五卅慘殺事件事實之分析與證明」，問世之日，轟動一時。由於「五卅事件臨時增刊」的發行，以及原定七月十日出刊，但延到八月中旬才出版的東方雜誌，登載有關「五卅」運動的圖文，致惹起英租界當局的憤怒，而向當時租界內的司法機關會審公廨提起控訴。以東方雜誌發行人王雲五為被告。十月十日第三次開審時，原告上海總捕房所請律師梅脫蘭曾說東方雜誌「銷數較一般報刊廣大，為禍亦烈」，無非詆毀東方雜誌之詞，然亦可窺出英租界當局對於風行全國的「東方」之既嫉且懼，固非嘗一朝低估東方雜誌言論之影響力也。

在訟案進行期間，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五號的「卷頭插畫」中，復從西報翻印五卅慘殺之真照片二幅，同時刊有「滬案之世界的反響」一評，及「上海空前慘殺案之因果」一論。繼續和英租界展開搏鬥。指出租界中「治外特權」形成之經過，其結語云：「上海租界為不平等條約所造成，而不平等條約又藉上海租界而擴張其勢

力，延長其生命。」

東方雜誌涉訟，滬界報業不為後盾，滬外報界，却已有人聲援。九月間，北京京報副刊的救國特刊中，曾有無悔先生作的「上海商務印書館五卅增刊事件」一文，提及作者的觀點，與旁聽此案審訊者的心聲。節錄如下：「上星期，報載上海商務印書館被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傳訊，因為他們在東方雜誌內出有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一書。當時就覺得很詫異，心想國尚未亡，他們已經把我們當作亡國之民看待，興起文字獄來了。……前日得鄧君來書，道及此事，他並且到會審公堂去旁聽的。我覺得這封信可以公佈，所以抄在下面：『大概工部局因中國人反對印刷附律，他們便偏要依據出版法，成立幾件案子，以備將來援引。而五卅事件中，商務中職工之行動，如捐款特而且繼續等，不免生恨，也乘此洩憤。尤重要的，是他們無理由地侵犯中國人之言論自由，……應特意看重，一致為商務後援。』……我們要是不甘亡國，對於這次事件一定要給商務印書館以一種有力的援助，來反對這種處置亡國之民的裁判。……」這段文字說明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工部局之陰謀賊害，早就被人看穿。再者，商務在王雲五先生領導下，不僅出東方雜誌臨時增刊，盡其向租界當局抗議的言責，商務同仁又繼續作大量的捐款，以資助五卅慘案中的不幸無告者。在這種竭盡心力的熱烈表現下，反映出王雲五先生及其所主持的商務、東方雜誌員工的愛國思想，民族意識。

之後，國民革命軍北伐，列強出面阻撓，英

水兵肇「一三慘案」，日人造成「五三慘案」，以暴行破壞我國的統一。東方雜誌均曾為文譴責侵略者的殘酷罪孽。克盡報人天職。（註16）

(三)

東方雜誌同仁為文化而奮鬥，為國事而奉獻的一貫作法，自然一再備受列強的仇視和迫害，一再為國難而犧牲了。第一次為「一二八」事變，日機接連數天炸毀商務印書館及東方雜誌社所在的東方圖書館，使全國出版界巨擘的商務，止存破壁頹垣及被燬之餘燼而已。損失數字超過商務資本三倍以上（註17）。東方雜誌遂隨商務的暫停營業而停刊。同年八月，商務復業，東方雜誌不久亦復刊。第二次因八一三事變，該誌暫停！改在長沙復刊，嗣以長沙大火，工廠被焚，移香港續刊，旋兼印重慶版。第三次則因太平洋戰事爆發，商務書館香港工廠全部為敵人掠奪，重慶工廠又有待整理與擴充，東方雜誌遂遭第三次停頓，三十二年三月又告復刊。第四次因共匪叛亂、神州陸沉而停刊，前年再在臺北復刊。

東方雜誌頻為國難而犧牲，却能屢仆屢起，不因敵人炮火而屈服，乃使該誌堅韌生命得以綿延不絕。其間主持大計者，正是王雲五先生，由於岫廬先生「兩年的苦悶」及「八年的苦悶」（註18）備嘗艱苦，商務書館之遭遇鉅劫，東方雜誌之暫停問世，其存在生命，不絕如縷，卒告復興。這中間，岫廬先生且多次從敵人的謀殺中死裡逃生，「一二八」及太平洋戰爭爆發，二度得脫日人毒手，三十九年在港幸免暗殺（註19）。

可見一位公而忘私，憂國憂民的讀書人常是危機四伏的，但像王雲五先生却經得起考驗，無畏於惡勢力的挑戰，把個人的生死榮辱置於度外，不因環境改變夙志，這種勇氣和毅力，是特別值得敬佩的。

(四)

再從大眾傳播學的角度探討，東方雜誌始終如一的專業精神，足可比美世界報壇上，任何同類性質的大眾傳播媒介，足以使任何激情聳動，唯利是圖的報業，望而生愧，黯然失色。在新聞自律、激濁揚清的領域裡，東方雜誌自然而居其一席中流砥柱的地位。

在迎拒讀者需求之間，東方雜誌一向不為金錢所左右，一向擺脫以賺足荷包為目的的淺薄觀念。反過來，該誌所企慕的，是傳播媒介影響的深遠廣大面，而不是毫無意義、曇花一現般的短暫刺激。

民國二十一年冬季，也就是東方雜誌經歷「一二八」敵機洗劫，沉寂半年再告崛起的那一年。某次該誌收到讀者來函，許多人要求東方雜誌恢復「新語林」、「世界一角」、和「拆散百科全書」等軟性文字欄，該誌編者公開答覆，堅持「我們不願意使東方雜誌，變成坊間流行的庸俗讀物，失却學術上的固有地位。我們只能從編輯方面力求引起讀者的興趣，但不能過分偏重軟性的文字，這一點應該得愛讀者的諒解。」（註20）

如果東方雜誌一味滿足讀者的軟性胃口，銷

路很可能激增，但其傳統的高尚格調，其啓迪民智功能，當必從此壽終正寢。

民國二十一年元旦出版的「東方」二十九卷第一號，譯載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描寫我國農民王龍一家的生活。賽珍珠女士的丈夫，曾任金陵大學農管系主任，賽珍珠因此僑居我國的時間

很長，這位諸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住過皖北，熟悉當地農民的生活狀況。因此能寫出這部感人肺腑的小說。東方雜誌編者在序文上說：「本篇所描寫的，不是我國大都市中，享受物質文明的上流社會的人物，却是內地農村社會的窮苦，愚昧，靠天喫飯的男女。這些我們的同胞們，雖然佔據我們人口的大多數，却是被我們學道的大人先生置在腦後的。現在布克夫人偏偏揀了這些可憐的農民來描寫，這在久居都市的富於布爾喬意識的讀者看來，也許不免有些嫌厭吧。然而我却以為中國的運命，全繫於這些哀苦無告的農民。」

像這樣報導農家窮苦這樣重大的問題，而不怕讀者的嫌厭，這豈是為營業、為銷路着想的做法？更何況東方雜誌披露農民問題的文字，屢見不鮮。（註21）

可見東方雜誌着重在捕捉歷史的精神和時代的脈搏，它是走向社會的十字街頭的，而非自居於學術的象牙塔裡。

在臺復刊的東方雜誌，王雲五先生在創刊號「卷頭語」說：「……主辦日報或期刊者，無不以流行廣大為其鵠的。然英國報界與期刊，則不盡相同，大抵別為階級的與民衆的兩類。後者旨在

銷數廣大，故多迎合社會之所傾向；前者則以倫敦太晤士報及曼齊斯達導報為代表，其言論風格不嫌曲高和寡，因是銷路雖稍狹，影響力却最強，實際上遠過於銷數十倍之其他日報。在期刊中，以經濟學人與當代評論為代表，流行均不甚廣，而隱握領導輿論之權。東方雜誌之一貫作風，毋寧與前述諸報刊相若。此次復刊，自仍本此作風，保持傳統，苟能發揮其應有之作用，則負擔經濟責任之商務書館，虧損縱多，所不惜也。」

岫廬先生此語，可圈可點，專業精神的前提，表露無遺。一個傳播事業具有透過新聞，引導民意向正確方向發展的責任，我相信東方雜誌主持者，就是把握了這個方向，作為行為的準則的。

(五)

東方雜誌重視國際局勢，是一大特色。該誌從前的世界論壇欄、太平洋會議號、國際研究欄、國際欄、國際現勢號，以及如今的時事分析、時事座談，在在顯示「東方」注意外交，正視國際現勢消長。

只有瞭解國際事物，才能起「文明排外」的作用，才能不受列強的侵凌，東方雜誌前身外交報創刊「序例」上就說過：「……觀我國所為於此數者，非惟不能盡排外之實，而助為虐焉，誠非本心，夫亦見地之不廣，作用之不密，有以致之。……舉我國對外之事實，與各國所以對我國之現狀之隱情，暨其國立法行政之迹，凡足資借鑑者，博訪而廣譯之。……出文明之手段，以盡排

外之責。」

就文化交流而言，東方雜誌自民十六年七月起，添「東方與西方」欄，專欄刊載中外人士有關東西文化，中外問題的看法。該誌不但研究列強的優劣，也探討我國的長短，這是一種不偏不倚，心平氣和的研究學問態度，十分正確。知人之長，我迎頭趕上，見人之短，我則改之，訴諸這種文明的手段，豈非有益我國家民族的富強。更予一味崇洋，或盲目排外者以當頭棒喝。

例如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東方」二五卷二十號的「英國研究號」，就強調英人之優點及缺點，二者兼顧，不持偏見或成見，編者在該號卷首語寫道：「……然而她欲在海上稱雄：前途亦頗多荆棘。……從另一方面看，她有根深蒂固的民治的基礎……教育普及……這都是她的長處：『觀過知仁』，我們不能全然忽視。」

東方雜誌同樣呼籲當局注意國際宣傳。當民初日本迫簽二十一條件之後，我全國譁然。東方雜誌十二卷第六號（民四年六月十日出版）就提出：「歐美各國，……國際消息，國際批評，幾於無日不有……效用則甚大。……日本比年，極注力於此，時有言論，發布於歐美報紙之間……頗聞此次對我交涉，曾間接直接，一再向歐美宣布其意見，謂仍當維持遠東之和平，決不侵害門戶之開放。故條件提出，局外各國，初不驚疑，迨我國輿論譁然，猶遲迴而不肯深信。則此意見之發表，先機制人之作用也。……今後而欲稍求勝利，排除國際之困難，其亦於此加意乎？」（註22）。

尤其是，東方雜誌記者，且有為國際宣傳而奮鬥的史實，立功海外，為祖國爭一口氣。那就是民國七年夏秋之間，國聯大會在日內瓦召開，東方雜誌記者何燮先生，與時事新報記者寄寒君，在我代表王景岐氏的電召下，一同由比利時前往日內瓦。那時日方代表蒙蔽國聯行政院，以致該院誤認濟南慘案係中國軍人有殺害行動，使日本軍隊不得不動武保護日僑。於是荷寄二先生遂展開一幕國際宣傳的鬭爭，終使許多外邦代表對我國加深瞭解。這場硬仗，打得相當漂亮，也得到可觀的收穫。時至今日，事實證明國際宣傳的重要。我國在聯合國之普獲友邦支持和尊敬，正所謂「得道者多助」，然若非政府比年積極從事國際傳播交誼，則瞭解我者，斷無如此之夥。當年何燮先生奮鬥的經過，曾撰一篇「新中國與國際宣傳」以記敘，登於東方雜誌二五卷第二三號（民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略謂：「……記者與時事新報記者寄寒君……於中國代表團晚九時不辦公之時間內，借到打字機，繕就三、五十函，分致各國代表，以約會請見。……此外尚有土耳其領事特約記者等談話，言及胡漢民遊歷土耳其時之情景。……各國代表受列強帝國主義之包圍，真假難明，是非顛倒，甚至視中國為野蠻時代者有之。待記者一一解釋後始恍然大悟。是以苟不欲揭破帝國主義之黑幕則已，誠欲揭破帝國主義之黑幕，而將中國之實情大白於天下，則非從事於國際宣傳不為功。」

東方雜誌的一項重大成就，即是：長期傳播各種知識，促進文化交流。創刊號曾揭櫫該誌「撰譯論說、廣輯新聞」的性質，該期內容則有社說（附外稿）、諭旨、內務、軍事、外交、教育、財政、實業、交通、商務、宗教、雜俎（中外大事紀），叢談（科學等），小說、新書介紹。可說凡政法理工文學，包羅殆盡。

就記述國內外大事言，為東方雜誌同仁從來的重大職志。「東方」六十多年來報導時事的圖文，率多第一手資料，如時事日誌，如職官表，如各種律法條文，重要文獻內容，如今都成了中國近代史，甚至世界近代史的珍貴資料。

許多歷史書籍，如「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如「國民革命史」（李守孔先生編著）等，均曾引用東方雜誌內的資料。

就介紹學術思想言，「東方」從未自弛其忠實報導的責任。如各派的社會主義，該誌在清末民初，即有系統的譯述，柏格遜和歐根的哲學說，當時在國內也由東方雜誌最先翻譯。

「東方」誕生之初，對物質科學的推介，就未曾忽視過，因科學界的耆宿杜亞泉先生，曾主編該誌十年，亞泉先生於清末維新時代，得風氣甚早，在上海創辦過理化傳習所。所以對於世界的新發明和新發見，從來就寄予密切的注意。（註23）

就整理國學觀之，「東方」採取精選的原則，彙輯確有價值的材料。「國學」方面，本誌未能多量的容納，却時時有關於敦煌不室和一錫樂業教等在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材料。本誌雖素不主

張誇大國粹論和「中外古今派」的調和論，而立言造論，要自有其悠久歷史的根據。……」（註24）

文藝方面，「東方」也有相當的貢獻。如林琴南先生所譯的小說（註25）和陳衍先生的石遺室詩話（註26），都是在舊文學界早有定評的。而王靜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註27），尤為不朽之作。至五四運動時代，東方雜誌更努力於新文藝的輸入，強調白話文學。十七卷（民九年）以後，白話所譯世界名著，西洋文學派別敘述，國內創作家的佳作，源源而來。

東方雜誌永久站在知識領域前哨的傳統格調，其貢獻的巨大，五六年七月九日中央副刊的短評（註28）上，有公正的論定：「東方雜誌在我國近代史上所負的任務及其具體的成就，就在知識的推廣。知識的推廣是一種開風氣的運動。整理國故見民族文化潛力之深厚；介紹新知見世界文化潮流之廣遠。兩者輔車相依，齊頭並進，一方面足以填補精神的真空狀態，另一方面足以堅定國人在心智上的自信心與自尊心。……世俗之謬見之一是：對於毒物，必須使用消毒劑。殊不知在毒物與消毒劑兩極端之間，都是同樣欠缺營養的。學術上的創獲，知識上的推廣，都是心平氣和，窮年累月孜孜不息工作的結果。它是單純而實在的。一定先講究基礎的穩定，紮實和深厚。一意求快、求新、求速，到頭來很可能陷入毒物與消毒劑的惡性循環之中，無由自拔。我其所以欣賞東方雜誌，就在其對知識的態度。而時代思潮有潮退，也有潮湧。在世界文化思潮沖擊之

下，確實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夠付得起自絕於世界知識門外的代價。單就此點着眼，東方雜誌復刊，難道不是我國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嗎？」

此評作者文壽先生可說是東方雜誌的知音。不是對該誌作過深刻的觀察和體會，斷無如此妥切的心得。誠然，「東方」是為知識而知識，希望為每一時代尋找出理性的聲音，而不齒欠缺氣血的消毒劑，不屑以衝動的意氣，引人入歧途。該誌前主編杜亞泉先生說得好：「舊習慣之破壞，乃新思想成立後自然之結果，新屋既築，舊屋自廢。新衣既製，舊衣自棄，今人不務築新屋，製新衣，而惟捲人之茅茨而焚之，剝人之藍縷而裂之，曰：『是即予之所謂新屋也，是即予之所謂新衣也。』則人安有不起與之反抗者，不但其茅茨決不肯為其所焚，其藍縷決不肯為其所裂，必且並新屋新衣而深惡之，而深恨之。」（註29）

杜亞泉先生這段話，譬喻毒物與消毒劑的惡性循環，見地細密，正是：唯有追求知識、建立新思想，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一意攻擊瑕疵，破壞而不知建設，徒增糾紛而已。「東方」在臺北復刊號，編者在「我們的想法作法與希望」中也提到：「……一些有熱忱但缺少學術訓練的人却以勇氣代替知識，以主觀的自信，代替客觀的智慧。整個社會思想的市場上充滿了似是而非的觀點，這又何怪乎一般社會大眾的言行之進退失據？要想解救這一種社會思想的貧血的危機，只有使學者從書齋走向十字街頭，以知識份子的面

目面對時代，社會。……我們所珍愛的是具有知識真誠的『意見』，而不是自以為是的『意氣』，『和而不同』是我們所欣賞的，『黨同伐異』是我們所不取的。」

文壽先生提出投稿人數統計，及投稿地域的統計，來證明東方雜誌的價值。是很實在的做法。他表示：「一個刊物，是不是貧血？是不是無甚價值？這兩組統計提出來的客觀數字，應為不爭之論。東方雜誌復刊號在投稿人統計，與投稿地域統計上可以媲美『中副』，可大可久之基，實奠基於此。」（註30）

由於投稿人地域的不同，我們可看出東方雜誌是風行海內外的，其影響範圍之廣濶可知。自民國九年到民國三十七年，東方雜誌的海外通訊，分別來自印尼、日本、馬來亞、泰國、奧國、葡萄牙、瑞士、法國、英國、德國、韓國、美國、蘇俄、菲律賓、比利時、印度、義大利等地。多為我國留學生或學者對其寄居國風土人情的報導，及當地政局、國際時事的分析。亦有學術思想論文。

在臺復刊的東方雜誌，創刊號海外稿包括：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平岡武夫的「白氏文集的刊本與舊鈔本之間」、美哈佛燕京社衛挺生的「論周穆王其人其事」、馬來亞柔佛李亦園的「我怎樣做華僑社會的實地研究」、美奧立岡大學壽德案的「對於『權力』含義的分析」。都很份量。

東方雜誌從無捧名作家的弊習。它的園地是絕對公開的。像梁啟超、吳稚暉、胡適之、羅家

倫、徐志摩、夏丏尊、郁達夫、謝六逸等等指不勝屈的成名人物，他們的鴻文散見於東方雜誌。就是偏僻鄉村裡無藉籍名的同胞，其智慧的結晶，也常在東方雜誌上發見。例如民十六年八月的該誌二四卷第十六號，命名「農民狀況調查號」，所登文字，多為農村居民所作，這些作者，來自貴州的大定、海門、川北、湖北西北、淮河流域、安徽的潛山、嘉應、淮北、宜興、南陵、井陘、武進、江陰、靖江、太倉、當陽、當塗、葉樹、義烏。字裡行間，細說當民農民生活景況。因為是實地的見聞，報導自必翔實，同樣替東方雜誌的篇幅生色不少。而且當更引起廣大農民的共鳴。

(七)

總之，東方雜誌自來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同其休戚，共其脈搏，艱苦支撐了六十多年，不為濁浪所吞噬，歷年負東方雜誌責任的諸君功不可沒。有人說一個人活了六十多年，已算是垂暮老者，然而，「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時日，它是心靈上的一種狀況」（註31），若一定要說東方雜誌已「老」，那麼，最多只能說：從外表看來它像一個壯健而智慧的老翁，有着美麗的紅色臉頰，和雪般潔白的頭髮。至於它的內在，依然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志氣激越、豪情奮發。我祝福這個獨立超然的文化界「老兵」精神不死。祝福這隻不死的「青鳥」，繼續為社會的喉舌耳目而奮闘。

「一張偉大的報紙不只是供垃圾桶墊底……」

不只是給人包魚蝦……不只是拿來摺洋娃娃……也不只是給小孩絮紙寫。」（註32）這點我們不用操心，相反的，據一位長輩告稱：民三十七年以前出版的舊東方雜誌，如今「洛陽紙貴」，時價甚至每本以美金五、六元論。令我感到遺憾的是全套的東方雜誌難尋。目前北部收藏舊東方雜誌的，以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臺大歷史系辦公室，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為較多，但都不全。其他中央圖書館期刊室，省立圖書館、政大社會資料中心也有零星點綴。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東方雜誌，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贈送的。希望學術文化機構或有心人，能蒐集一套，甚至數套完整的東方雜誌，對於近代史的研究，必有很大的裨益。如果再能編一部該誌的目錄索引，公諸社會，那更是功德無量了。

附註

- 註1：見學生書局印行「中國報學史」第一二八頁。
- 註2：載於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的「文華圖書科季刊」第三卷第一期二五——三九頁。
- 註3：獨立評論六十四號（民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九——十四頁。
- 註4：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七號（民十四年四月十日出版）赤塔通信「蘇俄的中國研究與東方雜誌」，作者齊水先生。
- 註5：見王洪鈞先生著「新聞採訪學」第三頁。
- 註6：民二十七年七月一日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十三號該社鄭允恭氏論著「蘆溝橋一週年」。
- 註7：見東方雜誌二十六卷二十號及三十一卷十二號。
- 註8：東方雜誌第三期「社說」楚青先生撰「論政府不可自棄」。
- 註9：東方雜誌第四期「社說」放士先生撰「論雪國饑宜先勵國恥」。
- 註10：光緒三十年東方雜誌創刊號「社說」欄開先生撰「論中國責任之重」。
- 註11：見東方雜誌二十三卷一號等。
- 註12：見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五號的東方畫報（民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 註13：上海江灣立達學園「一般」雜誌十月號（民十五年十月五日出版）中仲持先生作「上海的新聞界」。
- 註14：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中王雲五先生作「五卅事件之責任與善後」一文。
- 註15：見註13。
- 註16：見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九號、二十四卷三號。
- 註17：見二十二年四月出版的「申報年鑑」R七「一年來之上海出版界」
- 註18：詳見「岫廬八十自述」頁二〇一、二三九及三二四。
- 註19：見前書頁一〇〇「歷險的開始與其後數度死裡逃生」。
- 註20：東方雜誌二十九卷七號「編者作者讀者」。
- 註21：有關農民問題的報導，散見於東方雜誌二十五卷十六號「中國農民狀況調查號」，及三十卷十號側重農村危機。三十二卷一

號起到三十三卷十二號的「農村寫實欄」。

註22：見該號談屑欄，杜亞泉先生「國家意見之發表」一文。

註23：如民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二十四號出版，定名「愛因斯坦號」，主要介紹這位諾貝爾物理獎金得主的小傳及其相對論，和重要創見。

註24：東方雜誌二十一卷第一號（民十三年一月十日出版）「本誌之二十週年紀念」（堅瓠先生撰）

註25：林紓（琴南）先生所譯小說，散見東方雜誌，如十一卷一號「羅刹因果錄」，十四卷七號「桃大王因果錄」，十六卷十號「賄史」，「戎馬書生」等。

註26：石遺室詩話續編，在東方雜誌連載，始於十二卷七號，迄於十四卷六號。作者陳衍先生自號「石遺老人」。

註27：王靜安（國維）先生「宋元戲曲史」，見東方雜誌九卷十號到十卷九號。左舜生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話集」（文星書店五十五年一月初版）頁一五五曾載有「厭世自沉的王國維1877-1927」，引梁任公先生對王靜安氏「宋元戲曲史」的評價：謂：「若創治『宋元戲曲史』，莫述『曲錄』，使樂劇成爲專門之學。斯二者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度終無以度越其範圍。」（節錄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三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序文）

註28：作者文壽先生，短評題目爲「東方雜誌」。

註29：見東方雜誌十六卷十一號（民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何謂新思想」一文。

註30：同註28。

註31：見「青春」（Youth），作者辛尼加（Seneca 4 B. C.-165 A.D.）羅馬政治家，作家，戲劇家，斯多噶學派（Stoicism）哲學家，曾爲暴君尼羅王之老師，後獲罪自殺。

註32：見「世界報業」（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出版）一書頁二七「美國十大報」一文，此文係戴潮聲先生譯自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時代周刊（Time）原名「The Top V. S. Dailies」

鄧達澄著

實驗高級英文法

歷經修訂內容豐富實用
高中高職專校最宜採用

本書作者以其數十年實際教學經驗，著成本書，復經多次修訂，益臻完備。學子若能精通此書，非僅可奠定英文文法之深厚基礎，且足可應付任何有關文法與結構方面之考試。在台發行以來，已蒙百分之九十以上中等學校採用，咸認係目前英文法中最優良之教本。本館現已大量印製供應，歡迎各學校繼續採用。

爲減輕學生之負擔
每冊售價僅十六元
學校躉購另有優待

臺灣商務印書館 印行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郵政劃撥第一六五號